

上海“三资”企业效益浅析

许心礼

“三资”企业是我国一种新的特殊经济组织形式。它以市场为导向，在供、产、销方面同国际市场有着密切联系，对加速外向型经济的转轨具有驱动和促进作用。上海的“三资”企业从1979年颁布合资法到1984年止，进展缓慢，可以说是上海利用外资刚刚启动的第一阶段。1984年中央批准上海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后，为扩大外商投资创造了新的条件。于是，上海利用外资从1985年起进入第二阶段，发展比较迅速。到1990年7月底止，上海已批准的“三资”企业达807个，吸收外资25.42亿美元，吸收劳动力4.7万人。1985年“三资”企业产值仅占全市工业产值的0.3%，1989年已上升到4%。1990年上半年有了更快增长，其工业产值达123.26亿元，营业收入达110.8亿元。“三资”企业已进入成熟生长期。

目前，上海已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前来投资，外国驻沪商务机构已达513家。中央宣布开放、开发浦东4个月来，已有1500多批各国、各地区厂商到浦东考察，目前有70多个项目正在洽谈之中。上海已成为太平洋西岸对外商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地区之一。外商所以愿来，一是上海投资环境日臻完善，具有条件优惠、劳动力素质好、科技发达、行业齐全等优势；二是上海现有“三资”企业效益显著，外商在沪投资的成功率达98%以上，居全国第一，作出了投资样板，从而产生了外商竞相来沪投资的“磁性效应”。

一、“三资”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显著

(1) 外资投向进一步趋向合理。外资投

向生产性项目与先进技术型项目增加，非生产性项目减少。1985年，工业性、生产性项目不到投资总项目的10%，1986年也不到20%，1987年上升到68%。1989年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99项，其中工业性投资达174项，占87%，而房地产业仅13项，占7%，其他6%。到1989年的年底为止，直接投资用于工业生产性项目有528个，占投资总项目的70%以上。其中，有不少是先进技术型项目。据统计，近60家工业性“三资”企业被上海市确认为技术先进型企业。在漕河泾新技术开发区，独资或合资兴办了19个高新技术和新技术的企业，总投资2.1亿美元。中央各部和上海有关部门也在此区创建高、新技术产业群，内容涉及微电子、航空航天、光纤、生物工程、新材料、电子计算机等，上海的“硅谷”正在形成之中。

(2) 企业出口创汇显著增长。“三资”企业出口创汇发展速度很快。据统计，1985年全国“三资”企业出口创汇3.2亿美元，上海仅为400万美元。1989年全国“三资”企业出口创汇上升到35.9亿美元，上海上升至1.89亿美元。1990年上半年，上海“三资”企业出口创汇又跃升至3.4亿美元，为1989年全年的1.8倍。1989年全国出口创汇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三资”企业达804家，其中上海占66家，占全国的8.2%。上海已开业投产的244个生产型“三资”企业中，有169家出口创汇，占开业总数的69.3%。耀华·皮尔金顿玻璃有限公司1989年出口创汇3700多万美元，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此外如“联合毛纺”、“大江”、“跃龙有色金属”、“海欣长毛绒”等公司的出口创汇额每年均

在1000万美元以上。1989年,全市工业企业平均人均出口创汇额仅达1168美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略高于平均数,也只有人均创汇1274美元,而上海“三资”企业的人均出口创汇却达5920美元,要比全市工业企业人均创汇高出4.1倍,比全民工业企业高出3.6倍。

(3)企业内部外汇平衡逐步得到缓解。企业内部外汇平衡得不到解决,一直是阻碍企业发展的棘手问题。但随着我国有关部门的重视和企业出口创汇能力的加强,外汇自行平衡得到缓解。如在外汇平衡遇到困难时,上海福克斯波罗和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等均曾得到我国几百万或几千万美元外汇额度的支持。对国内确实要进口的一些产品,还采取了“进口替代”,使企业外汇平衡得到解决。据统计,1989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共调出外汇15.72亿美元,调进外汇仅4.9亿美元,即“三资”企业通过外汇调剂市场调给国营企业的外汇达10.28亿美元,这也有助于缓解国营企业急需外汇的困难。上海的情况与全国相比,情况可能更好些。全市“三资”企业外汇平衡户和平衡有余户占“三资”企业总数的88%,1988年调进调出差有1377万美元,1989年调出和调进的差额幅度比1988年有了更大的增长。当然,“三资”企业外汇自行平衡也有一个过程,有些是先进技术型企业,由于投资规模大和投资周期长,一时还未进入正常生产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外销困难,外汇自我平衡暂时可能还未做到,但这是企业投资进程的正常现象,今后会逐步好转。

(4)“三资”企业利润成倍增长。上海“三资”企业人均工业产值和利润较高。以1989年为例,以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达88052元(1980年不变价),3倍于全市平均水平;以工业净产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来看,全市平均为10569元,全民所有制企业为13075元,而“三资”企业

达30102元,高出全市平均水平1.8倍和高出全民所有制企业1.3倍。1989年全市工业企业每个职工创利3591元,全民所有制企业为4505元,而“三资”企业达11852元,为全市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平均水平的3.3倍和2.6倍。“三资”企业人均创利税达18304元,为全市平均水平的2.8倍。在闵行开发区内自1986年以来,“三资”企业的总产值和经济效益以逐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创汇绝对额已多年居全国14个开发区的榜首。

(5)“三资”企业对本市经济产生“联动效应”。“三资”企业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了国营企业的技术改造,对促进国民经济现代化产生了“联动效应”,并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实现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的过程中,引进了发动机制造、喷漆、焊接等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也推动了本市机电、化工、冶金、轻工、仪表等系统一大批配套企业及相关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更新,反过来又加速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的进程。到1989年底,已累计认可国产化零部件781项,工装样品认可国产化率累计达53.77%,停止向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订购的桑塔纳散装零部件累计已达到516项。目前一批技术难度大、节汇高的零部件(如变速箱总成、后风窗玻璃、传动轴总成、保险箱外壳等)均已实现了国产化,使上海的轿车制造业水平由50年代跨越到80年代,缩短了30年的差距,为发展上海最大的支柱工业奠定了基础。目前该公司已形成第一阶段年产6万辆轿车和10万台发动机的生产能力。

二、“三资”企业效益突出的主要原因

上海“三资”企业效益较好,这是与内外环境条件的改善和好转分不开的,具体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上海外商投资环境日臻完善。投

资环境好坏与企业活力直接相关。近年来,上海市政府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先后颁布33个地方涉外法规,以法律形式确保了外商的投资利益。如对“三资”企业的工会、物资购销、物价管理、外商投资项目咨询代理以及合法利润汇出等均作了明文规定,减少了失误。审批投资项目也从26个图章减到一个窗口办事,在远离市区的开发区内还开办了海关、商检、税收、结汇等“一条龙”的服务,深受投资者欢迎。基础设施也得到了相当的改善。特别是开发浦东的优惠政策,同样适用现有“三资”企业,这就更增强了“三资”企业的活力。上海对“三资”企业投资项目的设立比较严格、谈判反复推敲、审批反复论证,属于精细型的典型代表。与粗放型(项目设立比较宽松、谈判容易)相比,发展速度虽不及粗放型,但成功率比较高、效益比较好。

(2) “三资”企业产品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定产,产品开发针对性强,较少盲目性,故产品比较适销对路。

(3) 服务态度好,特别是销售后的服务十分认真。如申美公司生产的“雪碧”饮料,主动送货上门和主动回收空瓶,而且还免费提供冰柜等。

(4) 产品质量稳定。企业对质量严格把关,并把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线,不合规格和要求一律不准出厂,对维护企业和产品质量信誉不惜工本。如施贵宝制药公司美国总公司先后派100多人来沪检查把关,现产品已获得美国免验而进入美国市场。

(5) “三资”企业自主权大,有很强的竞争意识,企业运转机制灵活。如对人员流动(可择优选择)、营业方针和营销手段具有决策权,而且有些企业还可利用原有的销售渠道,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三、进一步发展“三资”企业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 需要继续改善投资环境。

上海的投资环境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软环境方面还不如人意,还需进一步改进。如对“三资”企业的医疗卫生、外籍人员的子女教育、中方人士安排和人才流动以及投诉等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应逐步加以解决。各级主管部门还应减少对外商投资企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如上海某“三资”企业准备把仓库建在底层以便进出方便,而有关部门认为下面有损美观,要求把车间建在楼下,楼上建仓库。其实这些事不必干预过多,应严防把管理国内企业的一套做法移植到“三资”企业。我们应按现行政策、法律法规办事,信守合同,不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对外商提出的各种要求、反映和建议,凡属合理而可以做到的应及时改进,该立法的就立法,该解决的问题就及时解决,而对不合理要求或一时难以办到的合理要求,也应解释清楚。对中方董事或经理也应严格考核、加强培训,选拔素质好和懂行的人担任。

(2) 协助“三资”企业解决生产上面临的问题。

主管部门应从大局出发,在原材料供应、配套资金等优先保证,各服务部门要加强服务意识,特别是电、煤气、通讯、运输、金融、海关、商检等要及时主动提供优质服务。办好一批“三资”企业,将影响一大片,这对提高上海和国家的信誉至关重要。特别对外向型的“三资”企业更要注意扶植措施的落实,以强化其外向运转机制。

(3) 完善对“三资”企业的管理。

对“三资”企业少加行政干预,决不是放任自流,合理的正常企业管理还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有些“三资”企业既怕中国现行体制下对国营企业的管理模式,又怕没有一个得力婆婆,出现问题无地可投诉而不能及时解决,他们甚至要求

我们能及早成立一个一杆子管到底的权威性管理机构,这也反映了他们的矛盾心理状态。

加强“三资”企业的有效管理已是当务之急。总的来说,来上海投资的外商大部分是正常经营的厂商。但也有少数外商,只顾自己赚钱,不顾合资或合营企业的利益,往往把设备进口、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大权抓在手里不放,以高进低出的手法来赚取大钱。如某家港商在郊县办了三家合资企业,仅进口设备一项就赚取了大量钱财,再以投资25%的比例办合资企业,进口设备所赚的钱远比他的投资额高,因此对企业办得好不好,根本不关心。有些合资企业还以种种理由,不按当时合同规定的外销比例,在我国国内赚钱,从而引起外汇自行平衡困难。象这一类企业就应加强有效管理和监督。

独资企业对我方得利也不多,外商往往隐瞒营业真相,特别是一些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用企业内部的所谓调拨价格,进行高价进口原料和器件、低价出口产品,逃避利润和税收,使我方得不到多大的好处。

外商的注册资本偏低。外商在总投资中除注册资本外,其余均在我国内筹措资金,加重了我方资金的压力。据1989年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对5个合资经营工业项目的评估,中方出资的现金比重达80%。以1988年初291家外资企业统计,注册资本仅占投资额的41.8%。为此,应进一步提高注册资本占投资额的比重,抑制肥水外流。

(4)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为了吸引更多外资和适应上海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建立多功能、多元化的金融体系。金融业不仅需要提供国内外货币的存、放、贷、汇业务,而且要求提供更多的、更新的全方位的国际金融服务,成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先导、媒介和支柱,并发挥其对外筹资、融资的独特功能。目前上海的金融结构、素质都难能适应这种需要。改进办法:一是加快上海金融体制改革步伐,二是

适度引进若干外资银行,独资、合资均可。上海现有的汇丰、麦加利、东亚、华侨等4家外资银行和3家外资租赁公司,还不能适应上海开发浦东和进一步利用外资的需要。开放部分外资银行,可引进竞争机制和新的金融手段以及新的经济信息,特别是能强化现有“三资”企业的融资、筹资,并带进新的外资,使上海成为沿海和内地对外筹资的窗口、国内国际进出口结算的中心。与此同时,也可促进国内金融体制的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逐步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为恢复上海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创造条件。

由于外资银行实力雄厚、客户众多、经营历史悠久、信息网络灵通,会对国内金融业带来一些压力。因此,在开放度上不能“一开都来”,而是分批分次逐步引进,在对象选择上也要考虑国别、资金实力、知名度与我国对等原则和经贸关系等因素,择优选择。并采取适度的保护政策,对外资银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完善金融体系,强劲的、运转灵活的金融机制,不仅可加速和完善对外资的利用以及促进对浦东的开发,更能促进上海九十年代的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轨的进程。同时,通过金融业的导向作用,更能发挥上海在资金、人才、信息、科技等方面的“聚散效应”,使上海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多功能、外向型的国际化大城市。

总的来说,上海近年来在实际利用外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上海的经济地位和要求达到的目标仍不相适应,利用外资的速度并不算快。1989年全国实际利用的外资金额达100.6亿美元,上海仅为4.2亿美元,占全国的4%。到1990年7月底止,全国批准的“三资”企业已达25220家,上海只有807家,仅占3.19%。为振兴上海经济,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发展外向型经济,还必须继续努力做好利用外资的工作。